

原道

第 1 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原 道

第 1 辑

《原道》编委会 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道/陈明主编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4.10

ISBN 7—5004—1602—4

I. 原… I. 陈… III. 传统文化—研究—中国—文集 IV
.G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2929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)

通县管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375 插页:2

字数:290 千字 印数:1—5000 册

定价:12.00 元

主编：

陈 明

编委：

刘乐贤
韩德民
赵 枫
靳大成
谢立中

《原道》编委会

本輯作者

- 李泽厚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。
- 庞 朴 中国社科院《历史研究》杂志社前主编。
- 叶秀山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。
- 陈 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，哲学博士。
- 辛 岩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助理研究员。
- 许 明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，文学博士。
- 靳大成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。
- 王树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。
- 马西沙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。
- 王邦雄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。
- 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。
- 郑家栋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，哲学博士。
- 余敦康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。
- 郭 沂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，哲学博士。
- 曾昭旭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。
- 王 青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，文学博士。
- 刘军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，法学博士。
- 李学勤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。
- 韩德民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。
- 付 谨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，文学博士。
- 陈晓明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，文学博士。

目 录

开卷语	(1)
-----------	-----

专 稿

李泽厚答问	同人整理(1)
文明与冲突	庞 朴(4)
谈“哲学”的“用处”	叶秀山(6)

思 想 编

中体西用：启蒙与救亡之外

——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展现(上)	陈 明(1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无本者竭 有本者昌

——湘军、太平军与文化传统	辛 岩(33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甲戌随想录	靳大成(62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难以承受的可为

——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审	许 明(7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文化的危机、融合与重建	王树人(95)
孔老的社会关怀	马西沙(115)
论语与老子的生命智慧	王邦雄(127)
谈谈“读经”	牟钟鉴(143)
再谈“实用理性”	李泽厚(152)

研究编

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	郑家栋(159)
欧阳修的《易童子问》	余敦康(192)
老庄孔孟哲学的底蕴及贯通	郭 沂(208)
论儒道之互为体用	曾昭旭(230)
武帝的用人政策及对两汉意识形态的影响	王 青(243)
儒学与汉代吏治	陈 明(260)
论恶与人性	刘军宁(281)
谈“信古、疑古、释古”	李学勤(303)

评论编

传统文化的危机与二十世纪反文化思潮	韩德民(31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边缘焦虑·国家主义思潮·意识

形态话语——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反思

..... 傅 谨(341)

分化的时代：众声喧哗与独领风骚

..... 陈晓明(359)

政治与经济：以文化为旗帜

——台湾“中华文化复兴运动”述评 澄 之(372)

编后..... (386)

李泽厚答问

问：在《原学》上看到你的声音又在国内出现，十分高兴。但是，我们又觉得这种声音十分陌生，好像你也要加入到复兴朴学的大合唱中去了。我们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，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是必要的，但面对现实，经世致用也同样应该提倡。比如说，对东方式现代化社会的目标、道路诸问题的探讨，就十分重要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，您有什么意见？

答：我最近给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杂志写了一封短信，其中提出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“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凸显。”鲁迅、胡适、陈独秀等退居二线，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等则被抬上了天。而从一些刊物的自我标榜看，仿佛有些人硬想回到乾、嘉时代去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具有思想史的意义，值得分析研究。我当然仍坚持一年前在《原学》上发表的对话，我仍然以为，相对于八十年代那种浮躁空疏的学风，这未尝不是某种成熟和进步。我向来反对连基本的知识也没有，就去建构空中楼阁的思想体系，从不相信一本书、一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现代化的诸多问题。我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对具体问题作微观的实证的研究。

但是，重视专门之学，强调细部研究并不就是一切。现在似乎又有“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”的味道，认为只有考据、微观、实证才是真功夫，而所谓“思想”则既不能称为学问，对社

会也并无用途,而且似乎谈思想搞宏观是非常容易的事,既不需要下扎实功夫,又可以“一鸣惊人”,双收名利,因此颇为鄙薄,似乎不值一顾。其实,这又大错特错了。真是差以毫厘,失之千里。学问家与思想家各有所长,各有其用。互相均不可替代。思想家又何莫不然?学问家固然需要基础扎实,厚积薄发,在知识结构上,思想家读书也许不如学问家精专,但在广博上则常有过之。思想家必须具有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,才能从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,提出问题,或尖锐或深刻,反射出时代心音,从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为思想家。可见所要求于思想家的这种能力便不可多得,而光有能力,没有足够的学识也还是不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宏观论著,那么多想当思想家的人中,却只有极少数论著和人物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论著或思想家。古往今来的学问家何止千数,而大思想家又有多少?

思想家不仅需要广阔的智力资源,在情感、意志、品格方面也有更多要求。人格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承担意识和悲悯情怀,便常常是其创造性工作的原动力。学问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电脑之类的机器替代,思想家的工作则不可能。此外就社会作用或历史意义说,设想一下本世纪如果没有鲁迅、胡适、陈独秀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?如果没有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呢,情况又是怎样?尽管陈、胡著作今日看来是如此的幼稚浅薄,也够不上真正的“思想家”,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,却比王、陈、吴更重要,尽管在学术史上也许相反。吴宓在这里作为一个代表当时学者、专家们的符号,又仅包括与《学衡》有关的汤用彤、柳诒徵等,也包括无关的如金岳霖、吕徵等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与《原学》编者对话中要提出思想史、学术史应有区别的原因。再其次,真正的大学问家又多少具备某些思想家的品格。这就是说他们的著作不仅有其专业学术领域内的价值,而且有时超出其专业,

具有某种更广泛的“思想”意义。王国维的历史研究所采取的近代方法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有关，并渗透了他对人生的思索，具有思想史的某种意义。陈寅恪之所以能够“较乾嘉诸老，更上一层”，也在于他有充满时代特色的自己的文化感受、思索和判断。我尝以为陈著是以“思想”而并非以“材料”取胜。同是治中古史的学问家岑仲勉先生，材料掌握也很渊博，他在史料的考证和编排上作了大量工作。但较之陈，二位的成就孰高孰低，孰大孰小，不很清楚吗？总之，今天中国既需要有大批（人数多多益善）从事各种专业研究的大小专家，也需要有一些（也许数量不必过大）年轻人去勇敢地创造“思想”。

问：我们对现在国学的升温既高兴又不满。高兴的是从八十年代的西学中心转到了对本土文化的重视，不满的是这种转换还只停留在术的层面。我们以为更重要的是道。您觉得呢？有什么可指教吗？

答：《原道》同仁有志于此我当然高兴，但我只能赠以张载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相勉，这是我国历代思想家的使命与追求。

问：谢谢！再问一句，您信仰什么思想？

答：唔，什么都有一点吧。

问：如果把您称为新儒家，您愿意吗？

答：愿意。但不是现在港台那种新儒家。

问：我知道，您是反对将儒学定义为道德理想主义的。什么时候您能谈谈，如果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，那它将表现出一些怎样的特征？

答：这很值得探讨，但现在还有些为时过早吧。

（同人整理）

文明与冲突

庞 朴

正当消闲性的报刊充斥书肆之秋，这几年，也崛起了近十种纯学术的严肃刊物。它们的酸甜苦辣，局外人无从得知；它们的存亡消长，却牵动着不少局外人的心。《原道》的出版，无疑在天平的一端又投进砝码一块。

“原道”是个大题目，也是一个老话题。大文豪韩愈写过一篇名噪千古的《原道》，力拒释道二教，高扬孔孟仁义，建构起儒家道统，开启了宋学先声。后来章学诚也写过《原道》上中下，谓道见形于三人居室，大成于周公孔子，隐晦于贤智之伦者之纷纷有见；他所谓的道，其实也只是一种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道；他要证明的，是那个社会的治统道宗。

在他们之前，《淮南子》里早已有过一篇《原道》，而且是开宗名义第一篇，从宇宙本原一直谈到人之所以应待万方。从后来通行的修辞学来看，这样的“原道”应该叫做“道原”，像《文子》中的某一篇那样；因为这个“原”乃本源之原，与韩愈他们用作动词之推究、考察意义的“原”字不同。

不管怎么说，“道”还是可以道的，也是应该道的，需要原的，也是值得原的。

以当今世界而论，人类将会怎样生存下去，应该怎样生存下去，这个虽已陈腐但却迫切的问题，便因人们对道的不同理解，而有着不同答案。

去年此日，美国教授亨廷顿扬言，未来的世纪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（主要是儒教和伊斯兰教的联盟）冲突的世纪。不料曲高和寡，驳议蜂起。亨廷顿教授大惑不解，复为论曰：If Not Civilizations, What?

亨廷顿教授立论的前提是（他大概以为那是不言自明的公理，所以不必说出），冲突是必然的应然的，所以他才会奇怪：如果不是文明，该是什么呢？

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，冲突是亨廷顿教授的道。

如果我们说，文明既与野蛮对言，也就与冲突无缘；文明本身并不含有冲突，冲突本身正是不文明的表现；只有当着采用不文明的手段去强行推销某种文明时，才显出仿佛是文明在冲突；而不同文明之间的自然接触、影响、交流乃至融合，都会是文明的即非冲突性的。这也是一种道。

真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！

亨廷顿教授谓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一来自儒教文化圈。冲突是另一回事，却也提醒我们反躬自问：我们的文化认同究竟是什么呢？

可见，我们应该原道，世界需要原道。

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

谈“哲学”的“用处”

叶秀山

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：“哲学”不管吃，不管穿，还有什么用处？

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庄子的一则寓言。一天惠子向庄子抱怨，说他有一棵叫樗的大树，因为太大了，木匠无法下手，所以工匠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真是大而无用。庄子说，你这棵树因其太大，而不受斤斧之砍伐，没有人加害于它，有什么可抱怨的呢。

这个寓言很有意思。庄子的意思是说，小有小的用处，大有大的用处。参天的大树不宜做桌椅板凳，即使有下手处，也不能“大材小用”，但庄子说，你可以“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”，沐浴于这棵大树之下的情趣，不是高级沙发所能代替的。

我想，包括“哲学”在内的“文化”产品正象那参天的大树一样，其真实价值，不在其有“小用”，而在其有“大用”。

这样说，并没有轻视“小用”的意思。人们的衣食住行当然是很基本的，对人的生活来说，是必不可少的。只是说，人的生活是复杂的，不见得吃不得、用不得的东西就没有价值。人不仅需要物质食粮，而且需要精神食粮。说精神方面的价值“大”，是因为它比物质方面的价值更长久，更深远。“大树”比“小树”的命长，是庄子说的“大年”。

“大树”之所以得享“大年”，在于它没有“眼前”的用处。一切

没有眼前用处的东西，都能得到更为长久的“保存”。“原始森林”未曾开发，它“保存”下来了；日月星辰尚未曾被利用，它们似乎为“永恒”。长城不再有防御作用，故宫不再住人，都成了“文物”“古迹”，供人游览(逍遥)瞻仰，为此而警卫森严地保护着。

不过，大树之所以未被用，不是因为它真的无用，而是因为它太大，工匠们“奈何不了”它，只好“由”它去了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惠子那棵樗树，在掌握了高科技的现代人们的眼里，也还是一个“小玩意”，或许早已派上了什么用场了。不要说树，就是那日月星辰、洪荒大漠，不都正在被人们开发着么？

人的科技的力量太大了，人的机巧也太高超了。樗树被砍伐了，那不能吃不能用的“文物”，也进入了商品市场，将它“拍卖”出去，转化成货币，于是也成了能吃、能用的了。据说这叫让“文物”“活”起来。

“文化”产品进入市场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，就象科技的发展必定要向日月星辰、大漠荒原进军一样；再说，“文化人”也要“谋生”，以自己的产品来换取温饱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何况，“物质的刺激”也会促进一下“文化”本身的发展，就象市场促进物质生产一样。这里所要“提醒”的乃是“文化”拥有自身的价值，就象“自然”也有其自身的价值一样，在“开发”的同时，我们应注意“保存”它们的自身价值，而如真的损害了各自的固有价值，则会失去“平衡”——“生态平衡”和“文化平衡”。“文化”和“自然”的自身价值，就是所谓的“大用”。

人的求知和控制自然的欲望是无穷的，但是实际的程度上都是有限的。人不是全知全能的。这样，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，总要有那“让它去”，“由它去”的这一层面。惠子的那棵大树，在那个时代的工匠说，只能“由它去”。

“由它去”、“让它去”的态度，是一种“无为”的态度，也是一

种“自由”的态度。这种态度倒也不完全是消极的，因为摆脱了直接实用功利的态度，往往能使“自然”的对象成为“文化”的对象，使“自然”成为“美”，使“自然之物”成为“文化之物”（文物）。这样，我想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Sein—Lassen，“使”（让、令、由）其“存在”，而海德格尔认为这就是“自由”。人对“自然”不采取直接功利态度，而采取“自由”的态度，于是一切“存在者”（Seiende）就成为 Sein；“自然”就成为“历史”、“人文”。海德格尔批评现代社会中“控制”思想的泛滥，称之为“存在”的“遗忘”。所谓“存在”的遗忘就是“历史”的遗忘，“人文”的遗忘，也就是只顾眼前利益，不顾长远的利益，只顾“小用”，不顾“大用”。

在“大用”的遗忘中，“哲学”有一种特殊的“提醒”作用。

一方面，“哲学”（的著作）在“小用”方面一无可取。它不但不管吃，不管用，而且那种“文化”产品中可以存有的“娱乐”、“消闲”（逍遥）的作用都因其过于艰深而大为减色。“哲学”有一个“科学”的体系，掌握起来也不很容易。谈哲学书不同于听音乐、观赏绘画雕塑、看电影，也不象谈小说和诗，更不是游览名山大川，古刹断垣。这给哲学书藉进入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难度。哲学家只得以“安贫乐道”来自我解嘲。“哲学”未必“贫困”，但“哲学家”大都“贫困”。

然而“哲学家”堪以自慰的是他研究的“对象”却正是那永远砍伐不了的“长青大树”，而以只有“大用”并无“小用”为自豪。因为其它的文化“产品”，多多少少会有点“小用”，似乎只有“哲学”，它的“小用”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，所以它只有“大用”。

“哲学”就其传统看，研究“无限”。“无限”大的“树”在原则上不可能有任何手段所——包括将收来最先进的高科技——来将其砍伐的，“无限”不可分割，因而它得以永久“保存”，而享其“大年”。

“无限”为“不受限制”，为“自由”。“哲学”正是以“自由”的态度来对待万事万物，在有限的事物中保持着“无限”，在功利和世界中保持着理性的、清醒的态度，也就是说，不执着于万物的“小用”，而着眼于事物的“大用”。

人们常说，“画饼不能充饥”，梵高笔下的“鞋”也不能穿，但却比实际的鞋有更大的意义，更大的用处。实际的鞋穿破了就会被扔掉，所谓“弃之如敝履”是也；但梵高画的“鞋”却具有永久的价值。康德将这种艺术欣赏的态度叫做“无功利性”(disinterested)，其实，事物一旦摆脱眼前实用的“小功利”，自会“显现”出那更为久远的“大功利”。

“哲学”对自身的“大用”要有信心，在日益发达的“小用”世界中多一种洞察力，要在那现实的、功利的世界中，更清醒地、更坚定地保持着世界的“大用”，而不必象古人那样，将“大用”植在那“无何有之乡”。

1994年7月19日于
中国社会科学院
哲学研究所